

东汉游学活动初探

方 燕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东汉时期由于统治者奖崇儒术,广设学校,选举重经学、重名节,游学之风盛行,表现为游学内容的丰富性、游学方式的多样性和游学学者社会出身结构的复杂性,由此造就了大批专心著述讲学的经学大师,培养和网罗了大批智能之士充实各级官僚机构,推进了儒家道德教化,促使师长与学生封建依附关系日益凝固化,并结成庞大的私人学术、政治团体。

[关键词]东汉;游学活动

[中图分类号]G529.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2—0071—05

游学作为古代社会各阶层的一种远道寻师受学的重要文化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经春秋、战国、秦、西汉相沿不衰,到东汉时期游学无论从数量、规模、影响上都超迈前代,成为一道蔚为壮观的文化风景线。本文拟就东汉游学的原因、方式、内容、影响等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东汉游学盛行的原因

东汉一代游学非常活跃,《后汉书》明确记载有游学经历者128人,而名师大儒门下从学者云集,及门弟子数百上千,著录弟子竟有达万六千人者[1](《儒林列传》)。游学之风的盛行,与东汉统治者奖崇儒术、广设学校、选举重经学重名节分不开。

东汉统治者尊崇儒学。光武帝“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1](《儒林列传》),明帝“垂情古典,游艺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1](《樊准传》)。东汉诸帝自光武始,多聘名儒为师,桓荣、桓郁、桓焉先后为光武、明、章、和、安、

顺帝讲授《尚书》。由于统治者的积极倡导,社会上攻读儒经蔚然成风,“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1](《儒林列传》)。

“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2](282页)。为励贤才、崇教化,统治者兴学倡教。东汉的学校分为官学、私学两种。官学又分为中央太学和郡国学。光武帝于建武五年(29年)重兴太学于洛阳,明帝曾到太学行礼讲经,和帝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太学时兴时衰,顺帝永建元年(126年)修缮太学,扩建240房、1850室,质帝时太学生已激增至3万余人,其中还有远道而来的匈奴子弟。除中央太学外,地方也普遍设学,分学、校、庠、序四级,“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3],官学得到迅猛发展,而私学在其影响下更是盛况空前。随着经学事业的发展及统治者对名儒的尊崇,经学大师辈出,他们或著书述志,或开门授徒。赴师门受业者称“及门弟子”,只挂名不受教者称“著录弟子”。由于及门弟子人

[收稿日期]1999—01—28

[作者简介]方燕(1969—),女,四川南充岳池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数太多,往往由高业弟子转相传授。马融就有“门徒四百余人,升其堂者五十余生,乃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入室者”[1](《马融传》),以至郑玄投其门下三年未见师面。官学、私学的兴盛充分反映了儒学教育的昌盛,也保证和加速了游学活动的蓬勃发展。

东汉学校教育是儒学兴盛的重要产物,学习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经典,学习目的主要是作官从政,与之相适应的选官制度便以德才两项衡量人品,并将学识包括于德行中,称经明行修。东汉选官的主要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两者均重经学和乡党评论。尤其是察举,专设明经一科,并倍受重视。章帝规定州郡按人口比例荐举明经,质帝允许明经举出的50—70岁的年长者进入太学,灵帝明令通经者可充任议郎官,顺帝则让明经下第者补为太学生。此外,人们要想跻身仕途,还须博采美誉。和帝诏令中提出“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1](《和帝纪》)。士人要想被官府举辟,必须砥砺自己的德行,或交游于名流学者之门,以获取声名,从而打开入仕的门径。

二 东汉游学的特点

东汉游学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表现为游学内容的丰富性、游学方式的多样性和游学者社会出身结构的复杂性。

(一) 游学内容以儒经为主而兼及其它各派

东汉儒学被尊为“国宪”,只要通经就可博取声望、禄利。名儒桓荣早先家穷仍讲诵不息,后官拜太常,曾对他的同族桓元卿深有感慨地说:“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1](《桓荣传》)。因此社会各阶层竞相向学,他们或专经研习,如程曾“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1](《程曾传》),士燮“少游学京师,事颖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4](《吴书·士燮传》)。或兼习几经,努力成为博学的通才,张紘游学京都,“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阚授《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4](《吴书·张紘传注》)。在学习儒家经籍的过程中,有的求学者还力图打破师法、家法的限制,注意兼通古今经文,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1](《儒林列传》),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

章句”[1](《卢植传》)。

游学者除崇儒诵经外,还研习其它各派学说。东汉讖纬盛行,便有不少人钻研此学。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讖,穷极其术”[1](《任安传》)。樊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颖川陈实少从英学”[1](《方术列传》)。黄老之学在汉初作为治国方略曾盛极一时。武帝实行更化,定儒学于一尊,黄老始衰,延及后汉,但讲习黄老之风不衰。杨厚“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1](《杨厚传》)。而刑名之学显于独尊法治的秦朝,汉初尚黄老而弃刑名,此学虽遭贬抑仍传授不绝,至东汉仍有以律令传家者,郭躬“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1](《郭躬传》);钟皓世善刑律,“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1](《钟皓传》)。此外,还有研习天文、历算、医学者,张衡与崔瑗同游太学,两人于五经之外涉猎天文、数学等方面知识,博学多能,后来张衡成为发明地动仪的著名科学家,而崔瑗也因在天官、历数方面的造诣为诸儒所宗。樊阿、吴普则从华陀学医,吴普擅长外科,樊阿精于针术,成为一代良医。东汉游学不限于专治经术,反映出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继承性,在儒学独尊、相对封闭的学术氛围中,仍透出一些生动活泼的气息。

(二) 游学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复杂,人数众多,规模空前

东汉游学者的社会身分和家庭出身状况十分复杂,上至公卿大族子弟,下至曹掾小吏、贫寒之士,只要有志求学,都可以不同形式寻师受业。

1. 官宦之家、经学世家子弟。东汉权门势家拥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受教育的特权,顺帝扩建太学后“使公卿子弟为诸生”[1](《左雄传》),质帝时梁太后下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1](《儒林列传》),因此官宦子弟游学拜师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马融为将作大匠马严之子,拜关西名儒挚恂为师,法真为南郡太守法雄之子,“好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1](《逸民列传》)。东汉时期由于对儒学政治、学术、社会地位的鉴定和推崇,出现了以儒经为家学传承的经学世家,但其子弟并不完全受家学限制,也可远道寻师,以增长才智见识。贾逵之父精研儒术,“逵悉

传父业,……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1](《贾逵传》)。李郃之父颉以儒学见称,官至博士,“郃袭父业,游学太学,《通五经》”[1](《方术列传》)。

2. 位卑秩低的小吏。东汉时期诸如亭长、狱吏、乡啬夫等均属位卑秩低的小吏,因其地位日渐卑微而备受人们的冷落,他们中一部分人由地方官送至京师受业,另一部分人则以任职为耻或失去兴趣而弃职游学,如范冉“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至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1](《独行列传》)。王霸“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1](《王霸传》)。

3. 寒微之家子弟。东汉游学突破了门第、财产的限制,普通民众只要一心向学,同样可以接受教育。如高彪“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1](《文苑列传》);王充拜师求学,自称出身于“细族孤门”,先世“以农桑为业”,其父“以贾贩为事”[5](《自纪篇》)。贫寒低微的游学者,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必须有人相助或从事劳作,才能入学维持学业。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1](《循吏列传》);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因“贫窶无资,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1](《桓荣传》),他们都是通过为人佣工而力学不辍。

4. 社会最底层人士。东汉时期即使是游手好闲的赌徒、犯罪者的子弟、官司在身的亡命徒,只要趋学上进,也可从师受业。吴人许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后在其妻规劝下“寻师远学,遂以成名”[1](《列女传》)。魏朗任县吏时兄长被乡人所杀,他持刀复仇后逃奔陈国,“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1](《党锢列传》)。岑晷之父在南阳太守任上触犯刑律被处死,岑晷“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见征,宾客满门,以晷非良家子,不肯见。晷留门下数日,晚乃引入。慈与语,大奇之,遂将俱至洛阳,因诣太学受业”[1](《党锢列传》)。

(三)游学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其常见的游学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入太学受业。“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

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6](《董仲舒传》)。太学作为京师养士储才的最高学府和学术文化中心,历来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成为游学者追慕和向往之地。游学者们或者经由太常选补,郡国遣送,或自筹学资,从各地涌入京师,成为太学生、诸生,就教于学问宏深、志行纯笃的太学博士。太学中既有白发老翁,也有稚气孩童。东汉盛行童子科,规定年龄凡在12—16岁之间,能通经典者拜为童子郎,予以特殊培养,因此太学中便出现了如臧洪、任延、黄香、杜安等称显一时的少年天才。其中黄香尤为引人注目,他年方十二,博学经典,号称天下无双。太学生毕业后或录用为官,或以著述为务,但也有“结童入学,白首空归”者[1](《献帝纪》),灵帝、献帝时就曾下诏征用这些老而无成者充任郎中、太子舍人之类的官职。

二是拜伏名儒门下学习。由于通经成为人们的进身之阶和社会上对名儒学行的仰慕,游学者在择师方面有所偏重,常从名儒受教。有的拜一人为师,如杨政“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氏易》”[1](《杨政传》)。有的以数人为师,如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1](《郑玄传》)。游学者为投拜名师,常常不畏险远,不辞劳苦,反映出他们对择师的慎重和虔诚。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1](《李固传》引谢承书)。孙期因研习《京氏易》、《古文尚书》而声名日高,因家贫牧豕于大泽中,求学者在田垄边追随他受教。游学者随师学经,需潜心专一,才能学有所成。桓荣师从博士朱普习《欧阳尚书》,“十五年不窥家园”[1](《桓荣传》),而成一代儒宗。卢植师从马融受业,马融讲经常以歌舞自娱,卢植“侍讲数年,未尝转盼”[1](《卢植传》),成为名重一时的学者。

三是师事达官显宦。东汉官僚中不乏学问精深者,这些人为发展个人政治势力,自觉地兼任起“师”的身份,而游学者因其地位、学问亦前往就教,以此涉足政坛,扩大知名度。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1]

(《杨伦传》),钟兴“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1](《钟兴传》)。但招收生徒的官僚中也有纯盗虚声、罗致亲信者,据《后汉书·酷吏传》载,御史中丞周纡上书弹劾夏阳侯窦瓌“学无经术,而妄构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桀”。

四是广泛求师。有的游学者求学受教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或先入太学,后投于私学大师门下,如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每当至讲时,辄窃听户壁间”[1](《服虔传》)。或先师从名儒,后游太学。“(董)扶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穷极图讖。遂至京师,游览太学”[4](《蜀书·刘焉传注》)。游学方式的不拘一格,有利于游学者增广阅历,也有利于打破汉代经学师法、家法的限制,汇通古今之学。

三 东汉游学活动的影响

首先,游学活动造就了大批专心著述讲学的经学大师,对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游学之风的盛行使社会各阶层趋学守文,使游学者努力成为通晓一经的名儒。这些人学成后除做官为吏外,大多从事教学、著述。他们中有的由保举、考核充任博士授业。《后汉书·樊准传》称“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有的聚徒讲学,潜心学术。王充入太学,师从班彪,后归乡教授,并著书立说,集三十年心志写成哲学政论巨著《论衡》。郑玄拜数位名儒为师,多次拒官,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遍注群经,奖掖后进。对此,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被,士皆以通经绩学为业”[7](283页)。在私学大师中,有的来自僻远之地,他们返乡授业,致力于改变这些地方落后的文化状况。桓帝时牂柯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南蛮西南夷传》)。

其次,游学活动培养和网罗大批智能之士充实各级官僚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巩固了封建政权。东汉时期因游学的活跃为封建政权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官吏来源的

问题。由于士阶层普遍具有入仕精神,游学者以学问为官从政者比比皆是。《后汉书·桓荣传论》载:自桓荣至桓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除进入中央机构外,许多有游学经历的人还大量涌入地方政权机关,张皓“少游学京师,永元中,归仕州郡”[1](《张皓传》);魏应从博士习《鲁诗》,扬名京师,“后归为郡吏”[1](《魏应传》)。

再次,游学活动推进了儒家道德教化的社会化,在引导社会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汉游学者所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儒家是以伦理道德为教,正如董仲舒所说:“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8](《王道》)。游学活动的兴盛使统治者得以借助社会办学力量向人们普遍灌输伦理道德观念,从而使人们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再加上东汉以经明行修、乡党评论作为品核士人的主要标准,也促使游学者砥砺自己的德行,重视道德修养,儒家道德渐渍社会而成风俗,所以“朝政淆乱,奸臣擅权,士风激励,以敢为敢言相尚,故争树名节”[1](《儒林列传》)。《后汉书·儒林传论》中将东汉倾而未溃归于“学之效”、“人诵先王言”,虽有失偏颇,但却反映了儒家道德教化在稳定东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最后,游学活动促使师长与学生封建依附关系日益凝固化,并结成庞大的私人学术、政治团体。游学者远道从师受教,在师长与学生之间形成了不可僭越的封建依附关系。东汉无论官私学都强调师长的权威和学生的服从,在学术上,学生必须恪守师法、家法,“专相传祖,莫或讹杂”[1](《儒林列传》)。在政治上,依靠师长以图仕进,司徒鲁恭“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1](《鲁恭传》)。在日常生活中,学生除对师长恭敬有礼外,还负有各种义务。师长居贫,学生要奉命劳作,如李恂免官回乡教授,常和诸生织席自给。师长蒙难,学生应全力相救,杨政之师范升因事入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抢升之子潜伏道旁……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政犹不退”[1](《独行列传》),范升因此被救出狱。但这种救助有时不问情由,不辨是非。夏侯惇因师受辱沦为杀人犯,“以烈气闻”[4](《魏志·夏

侯惇传》)。光武时名儒欧阳歙因贪污罪下狱,诸生向天子求情者千余人,平原礼震上书自请代死。此外,师长故去,弟子必须奔丧、服丧。名儒大师去世,弟子服丧往往成群结队,乐恢饮药而死,弟子服丧者数百人;楼望、郑玄卒时弟子会葬者千余人。在为师奔丧的过程中,许多事迹感人至深。延笃为远吊师丧毅然去官;任末千里奔丧途中病故,遗嘱必陈其尸于师门;张季礼远奔师丧,行至汝南地冻车毁,刘翊见状慷慨让车,并赞其“慎终赴义”[1](《独行列传》)。在这种团体中,师生相互

依存、荣辱与共,学生推尊其师如其父,而师长除传道授业外,视学生如子弟,荐举为官,导其成名,有的还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如赵典每得朝廷赏赐用以资助贫困学生。但师长如遭不测,学生也会因此而受株连,“党锢之祸”中,“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1](《党锢列传》)。这种私人学术政治团体的形成不利于游学者自由、全面地发展,学界政界也因派别林立陷入一种相对涣散分离的状态。

参考文献

- [1]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四书五经[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 [3]班固. 东都赋[A].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4]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王充. 论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6]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赵翼. 廿二史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8]董仲舒. 春秋繁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Attempt at Dong Han Learning Activities

FANG Ya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Because its rulers revere Confucianism, widely set up schools, select officials with emphasis on the candidates' learn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ir reputation and integrity, learning prevails in the Dong Han Dynasty, and shows an abundance of subjects, a variety of patterns and a complication of the learners' family and social background, which brings up a large number of great Confucian scholars devoted to writing and lecturing, trains and enlists a great number of intellectual and able men for bureaucrat setups at all levels, pushes on Confucian moral cultiv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solidification of feudal dependence of learners upon their tutors, and forms huge private scholastic and political groups.

Key words: The Dong Han Dynasty; learning activities

[责任编辑:凌兴珍]